

讀王夫之說「一概之論」、「定論」

● 趙 園

讀明人文集，尤其明清之際人物的文集，偶而會有意外的驚喜。明代政治的戲劇性，明清之交的歷史情境，都足以磨礪士人的思維，使其中的有識者顯示其政治智慧與鋒銳的洞察力。比如王夫之史論（《讀通鑒論》、《宋論》）的說「一概之論」、「一切之法」，說「異端」，說「貞勝」、「定論」，說「正統」，說「篡」、「弑」，以及說「義軍」，說「循吏」等等。翻動「故紙」，你不是總能得到這種智慧的愉悅的。當然，你還會覺得那時代並不遙遠，那些話題也並不古老，等等。

王氏史論中提到「一切之法」、「一概之論」處甚多，這像是他熱衷的話題之一。比如在《讀通鑒論》說「利民者，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為典要，唯其時而已」；說「時勢異而一概之論不可執」；說「唯格言之是據，則仁人君子之言，皆成乎蔽」。這意思《宋論》中也反覆申說，不厭其煩。其針對性，大約就有明代當道及建言者的泥古不知變通，言路的嗜好「搏擊」、且

朝堂對抗的必據典要（以便「立於不敗之地」）。明亡後，追究亡國責任，就很有些人指出「國君死社稷」說的似是而非、食古不化；就我所讀到的，也以王夫之將此義分割得最為透闢。

我以為更有趣的，是王夫之的動機論，即持「一概之論」者的居心何在。中國人在這類題目上向有特殊的敏感，但說得如王氏那麼斬截痛快的，也並不多見。明清之際最稱著名的學者，都有某種直接的政治經歷，這使他們的議政，不致全是書生的迂論。古代中國的士人又注重所謂「人倫鑒」；政治經驗加人事洞察力，在辨析「情僞」處，有時像是比之現代人，更多着幾分穿透力似的。你讀到王氏所說「學者之言學，治者之言治，奉堯、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：我察其情，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」時，就不免要會心一笑。他所說「揭堯、舜以震廷臣，而示之以不可攻」，更是直接得自朝堂的觀察，應算得「一針見血」的吧。至於王

氏本人的指斥時弊，時或出語激切，作「一概之論」，幾不留餘地，也仍是明人習氣。批評「時尚」的，往往也在時尚中，亦一種常見的困境，無可奈何的。

黃宗羲也指斥過「假托」朱子者的據「一定之說」詆別人為「離經叛道」。這類伎倆，你決不陌生：都是「過來人」了。但讀前人的上述議論，你仍會想到今人的不長進。畢竟已過去了三百多年——我這裏還只是由明清之際算起。

王夫之的說「一概之論」固然會令你心一笑，讀到他的談「貞勝」、「定論」，你或許會肅然歛容。那意思似乎古人中少有人說過，當然更可能是我孤陋寡聞。王氏所謂「貞勝」，是對於「相勝」而言。他看穿了相勝雙方的依存關係，進而看到了相勝中的彼此，可能正處同一系統中。這又得自對明末黨爭的就近觀察，與他的論「君子小人」相通。他以為僅相勝不足以言「貞勝」，「貞勝」不同於囿於彼此之爭，為彼所範圍的此勝（即「一事之兩端」的相勝）。「貞勝」者非由彼之非而成我之是：我之勝，所賴「確乎其有不拔之守」。「定論」自然也是不倚於彼的自足之論，王氏所謂「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」。這是不依賴「對比」、「對抗」的自足的真理性。至於這種「真理性」如何確認，他似乎以為是不言自明的。

王氏談及黨爭時的「不爭」論，置於明末的政局中，究竟有怎樣的實踐意義，是大可懷疑的，但他所發現的黨爭式的對抗對於理論學術的損害，一如他發現的患難（「坎坷」、「疾疾」）對士人心性的損害，都不失為真正的

「發現」。這裏應有明代學人深刻的命運感的吧。而且我覺得表達也深刻，非一味說「時」說「命」者可比。

毋庸諱言，我的有感於王氏之論，多半因了幾十年間的「大批判文化」，以及於此相關的「駁論傳統」，以及古老的「翻案法」的衣鉢相傳——後面的說法似又有些混淆。「翻案」與其說是一種思維方式，有時毋寧說更是一種文章技巧，本無所謂優劣，運用之妙，正在於一心。我們的古人用此法很翻出了些新意的。只是到了沒出息的後人手裏，有時只為了掩飾理論能力的薄弱，不免愈趨愈下罷了。這裏還沒有說到純粹的意氣之爭，徒以口舌相勝的那種爭。至於全無思想，只打算靠了氣勢洶洶取勝的，就不但等而下之，簡直沒有了評論的必要。但你也不可小看了此等文字：在某種政治情境中，它們是很派用場的。

似乎無需解釋，我決沒有看輕了「駁論」的意思，倒是覺得王夫之不免囿於剛剛成為過去的明代，將「不相競」、「不爭」過分強調了。但由此也可見，倘若沒有一種健全的學術空氣，沒有普遍的學術道德（姑且借了前人的一個「誠」字），甚至連這類談論也很難正常進行的吧。

1993年11月

趙園 196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。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。著有《艱難的選擇》、《論小說十家》、《北京：城與人》、《地之子》等。